

新文学论丛丛书



小说创作谈

阎 纲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徐中益

小说创作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5,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2

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

书号 10019·3021

定价 0.62 元

序

这本书的序言，阎纲同志要我来写，我是经过一番忐忑之后才定下来的。

为什么忐忑？因为我们是同辈人。在我的观念里，同辈人作序，似乎有点儿违犯习俗。在我的印象中，写序，多是长辈对晚辈、老年对青年，同辈之间似乎不多。因此，对这件事，我确曾忐忑不安，有不敢从命之意。

为什么又定下来要写呢？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下了决心。一是他评过我的小说《昨天的战争》第一部，而且提出了若干批评性的意见，这使我可以避嫌；二是我参与了他这本评论集的一点儿工作，说几句话，实际上也是在干工作。这样，我的思想就解放了，事情就定下来了。

在中年的文学评论家中，阎纲同志是颇为勤奋活跃的一家。这本《小说创作谈》，是从他二十多年来一百四五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就是说，除小说之外，他还有对其他文学样式的评论之作以及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篇什。他在文艺杂志从事编辑工作，

评论的写作多在业余进行，如我们的许多同辈人一样，他的写作条件也是有困难的。但是，从他的或长或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一直比较注意我们文学创作的新的状况，他的评论同创作实际一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四人帮”覆灭之后，这三年来，对于文学创作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兴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他更是热情地呐喊助威者之一。从集中还可以看出，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解析主题，而是力求对所论的作家及作品进行艺术的分析，力求在文字上生动活泼。正因此，他的评论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

我们的创作需要大繁荣，我们的评论也需要大发展。创作繁荣的关键在于百花齐放，评论发展的关键在于百家争鸣。作品是评论的对象，评论家是作家的朋友，同时又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当然，只要是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即使论家不评，读者也自有公论，因为正如人们常说的，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但是，我想，如果有许多评论家出来发言，各抒己见，那岂不是一种更红火的景致吗？

说到评论，我常常想起杜勃罗留勃夫、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三个人，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中，起了何等大的作用呵！他们通过自己的评论活动，不仅宣传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

治主张，而且发挥了一系列美学见解。我总觉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评论活动，论证和创造了一个文学时代，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文学评论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人的消遣，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战斗事业。“四人帮”全盘否定他们，已被证明荒谬至极。我觉得我们不仅应该研究他们的遗产，还更应该研究他们的活动经验，以发展我们自己的评论事业。至于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遗产，那是自不待言的，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丰富它和发展它。

我从阎纲同志这些评论中得到不少启发。我相信，再过几年，当他重新编一本集子时，那份量将会比现在重得多，它将会是我们的创作进一步繁荣、评论进一步发展的有力证据之一。

孟 伟 哉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序.....	孟伟哉 1
谈长篇小说的创作.....	1
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	
——给一位短篇小说作者的复信.....	16
中篇小说的兴起.....	31
人物与环境	
——梁生宝与蛤蟆滩.....	52
在“对立”中刻画人物	
——《创业史》艺术谈.....	64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	78
《红岩》的人物描写.....	95
读《红岩》第二十四版记.....	120
悲壮啊，农民革命！	
——读《红旗谱》续集《播火记》.....	129
小说《沙滩上》	
——兼谈王汶石短篇小说的特点.....	150

象刺绣一般精细	
——读茹志鹃短篇小说集《静静的产院》·····	163
绘声绘色的《大波》·····	177
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昨天的战争》第一部读后断想·····	185
谨防灵魂被锈蚀	
——为新作《班主任》叫好·····	198
思想解放的勇气	
——评《阴影》·····	204
铁窗关不住的光明	
——读获奖小说《看守日记》·····	209
讽谕艺术之一例	
——读方之小说《内奸》·····	217
关于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通信·····	225
（附孙犁、韩映山的信）	
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	
——谈《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技巧·····	241
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	256
小说史上光彩的一页	
——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	259
后记·····	271

谈长篇小说的创作

阅读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如同徜徉在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天地”，知人论世，目不暇给。在这里，长篇作者充当了生活导游者的脚色而赢得广大读者的信誉。然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的出世谈何容易！

建国十七年间，出了一批好长篇，如人们习惯于说的“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一创（《创业史》）”。其实，“三红一创”之外，还有《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里湾》、《山乡巨变》、《苦菜花》、《风雷》、《艳阳天》等等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出版的盛况，中年以上的读者一定记忆犹新。那时，争相竞读长篇小说成了一种风气。一九六六年以后，长篇创作在呻吟，在困难中成长，而御用的帮文艺却搔首弄姿，招摇过市。《虹南作战史》、《西沙儿女》之类的东西，大大地败坏了长篇小说的声誉。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翻出十七年间的长篇偷偷阅读。长篇小说，同其它文艺样式一样，产生了危机。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年底，长篇的出版就起了变化，见了成效，有了收获。我们当时高兴地读到了沉默十年的老作家柳青和姚雪垠同志的大作，我们捧起《创业史》二部上卷和《李自成》第二卷那样如饥似渴地读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长篇，例如《创业》、《昨天的战争》、《将军河》、《义和拳》、《古玛河春晓》等。这些长篇，一反“批判走资派”的题材，一反钦定的“三突出”的禁忌，把长篇创作毅然决然地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轨道上拉出来。一九七八年，我们又高兴地读到了《第一个回合》、《翻身记事》、《云崖初暖》、《龙虎风云记》等一批较好的长篇；年底，特别高兴地读到了魏巍同志三卷本的《东方》。这部长篇，特别是它的前多半部分，堪称为优秀之作。今年，又相继出版了《上海的早晨》（三）、《桥隆飙》、《山菊花》、《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北山记》；《第二次握手》开始在报刊选载和连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可能还有好的长篇出现，笔者孤陋寡闻，它们在读者中是不会被埋没的。

然而，不必讳言，在整个文学创作中，比起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来，长篇小说是明显地落后了。其它的文学形式，先后不同程度地冲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题材，正视了现实，恢复了生活的真实，博得读者一片赞扬声。长篇小说，相形见绌了。目前的状况是，历来为读者喜读的长篇体裁，

出书很多，却有相当一部分新书卖不出、借不出；买了、借了，但难于卒读，使长篇在读者中的声名大跌。每念及此，作者、编者和读者，莫不为之焦虑。

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现在的年轻读者眼头高了。以我看，对于长篇小说，年轻读者不是眼头高了，而是希望更大了。经过十年来的痛苦磨练，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们的生活阅历和思想认识大大提高，当然不能容忍长篇创作或倒退、或停滞、或缓行的落后状况。年轻读者对长篇的现状不满意，是因为长篇小说未能提出他们迫切要求参与的生活问题，因为长篇小说作者的认识反而不如读者敏锐深刻。从文艺作品流传的状况看，除去那些艺术上完美、思想上健康、富于历史知识和生活智慧、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的作品之外，青年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尖锐的主题，关于同志的、战友的、友谊的、亲属的、爱情的等各种关系的真实的描写，关于揭露“四人帮”、颂扬老一辈革命家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广泛的题材。对于长篇小说，他们希望以上有关的主题、内容、题材能够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反映。而这一切，比较集中地表现在题材问题上。经过“四人帮”一场浩劫之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迫切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学重新认识和探索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防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惨剧在中国重演。重演即要亡国灭种。人们不能不对此百倍地警

觉和防范。人们并不是爱好眼泪、哭声、流血和死亡，而是想要看到这些眼泪、哭声、流血和死亡怎样化作仇恨、教训、理想和力量。人们无意要使我们的文学穿上丧服，而是盼望我们的文学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照现在，也照过去，照过去照现在，为了照将来。从《班主任》开始出现的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以及《伤痕》引起的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可以看出曾经维系着亿万人民、千家万户生死存亡的这类题材，以及这类题材提出的尖锐问题，对于广大读者产生了何等强大的吸引力！书店里摆着不少长篇小说无人问津，但是有些不知名的长篇作者仅只写出提纲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的读者反映，他们不喜欢那些老掉牙了的故事，希望长篇作品以更大的规模写过去十年的斗争和今天的胜利，反映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其次，如“四·五”题材和“四·五”精神，爆发了一次诗界大革命，推动了戏剧、短篇小说、散文等体裁的大突破，为什么长篇小说安于现状呢？长篇小说作者正在从中接受深刻的启示，但要大见成效，看来尚需时日。

列宁在表彰托尔斯泰的作品（当然，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时深刻地指出：“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

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出现以后，使及时地反映生活、深刻地理解生活、生动地描绘生活的长篇小说，获有“生活教科书”的美名。鲁迅称长篇小说是“一时代的纪念碑”。高尔基的《母亲》，被列宁热情称赞为非常适合时宜的书，因为它在俄国工人阶级运动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转变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正确地回答了问题，及时地充实了政治、帮助了革命。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我们的长篇作者，也一定能从中受到深刻的启示。

但是，不少长篇作者坦率地提出了问题，认为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好写，越尖锐的现实题材越难写，据说是由于许多问题尚未做结论，许多政策还要再研究。其实，这不应成为作家望而却步的原因。搞文学创作当然要学政策、宣传政策，但不要重复错误的口号“写政策”。作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党的文学和党的政策都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认识手段。党的政策来自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生活运动的规律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少同志熟悉斯大林一九三二年对作家的这段谈话，他说：如果作家能够“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在生活中就

不能不看到，不能不表现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说：“写真实！让作家到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的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是对文学真实性的最直截了当的唯物主义的阐述，是对生活与政治、真实与政策诸关系在本质上的通俗说明。党对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政治、政策的方式进行总结，也可以借助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为历史的总结打通道路。这是文学艺术的一种重要职能。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能说鲁迅的作品如《阿Q正传》等不是对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的深刻总结，对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策略没有产生借鉴作用？长篇小说是文学艺术的重武器和“大炮”（高尔基），更应该充分发挥这一职能。长篇小说的规模可以十分巨大，容量可以非常丰富；它在表现力和影响的强烈深刻方面，几乎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艺术样式。因此，一部堪称史诗的长篇小说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汇集”社会的“全部历史”。古典著名作家形容长篇名著时，经常这样惊叹地说：“整个社会都让它囊括殆尽了！”当然，它也就如列宁所说，“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历来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没有脱离政治、悖逆于政治，而且必然地产生巨大影响于政治。长篇小说不

应该消极地“等政策”、“写政策”，成为政治的单纯的号筒，而应该成为政治的触角、能动的喉舌。长篇小说不能只满足于充当政治的驯服工具，它何尝不可以布达政见、以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修订？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是长篇小说的冒失，而是长篇小说的一大特长。妨碍这一特长发挥的，不是思想还没有解放，就是怯于独立思考，缺乏真知灼见。记得一位还健在的老作家，在六十年代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大作家，其所以写出大作品，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通过艰苦的摸索，发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我们的有些作者太幸福了，一开始就有毛泽东思想，有党的政策观点作为指导。但也太可悲了，他们用这种思想政策代替自己通过形象反映出来的独特的主题思想，因而产生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意思是很深刻的，是老作家的经验之谈。可惜，现在我们有的作者还没有摆脱这个被颠倒了的认识过程和创作过程，以致在政策作了改变以后，几十部、成百部化为纸浆，十几万、几十万字顷刻报废；而真正来自生活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其魅力却历久不衰、世代流传。没有作者主见的作品，没有自己独特的主题思想的作品，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艺术品。这是小说史上屡见不鲜的教训，是长篇作者们极力要冲破的难点。

我们的长篇小说作者，如果能象列宁总结托尔

斯泰的创作时说的那样，“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速转变”，“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长篇，就有可能“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无产阶级作家应该比托尔斯泰看革命更高明，我们有《讲话》的教导，有鲁迅的传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今后的发展将是无可限量的。

艺术质量不高，也是目前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许多长篇小说，读者看不下去；即便硬着头皮看下去，看完就很后悔。人们正在为实现“四化”而争分夺秒，谁都宝贵自己的时间，我们不能埋怨读者太薄情。长篇小说是时代的镜子，革命的史诗，民族文化的结晶，民族心理的一面窗户。长篇小说人物多，事件多，线索复杂，规模宏大，要求有很高的艺术的典型性，要求长期生活的积累，大量丰富的知识和见闻，成吨成吨的语言矿藏和类似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那样的提挈能力。它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光是大厦的结构，如安排人物间的关系，部署事件的交叉，埋藏伏线以及前后呼应等等，既严密而又毫无人工气，就足以吞噬作者的全部智力。《创业史》的作者柳青，为这部长篇的写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说道：“写第二部时，每一章的构思和写作时间很长，一般需要三、四个月。”但是，恕我直言，我们的有些长篇作者，从生活到写作，花的功夫实在太

少了。

要提高艺术质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物的塑造。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首推长篇小说对人物的塑造要求最严、最高。人物塑造如何，决定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的粗细、文野、优劣、成败。没有艺术人物，就没有艺术情节；离开艺术人物和艺术情节，无所谓小说创作。开国以来，我们长篇小说人物画廊里，至今葆有艺术青春的不乏其人，英雄人物如朱老忠、周大勇、王老虎、杨子荣、许云峰、江姐、赵玉林、梁生宝、高增福、郭祥等；其他人物如梁三老汉、严志和、林道静、娟子娘、糊涂涂、周炳等；反面人物如张灵甫、徐鹏飞等；历史人物如李自成、崇祯皇帝等。可喜的是，在有些长篇小说如《铜墙铁壁》、《保卫延安》、《创业》、《云崖初暖》等作品里，都以多少不等的笔墨竭诚地再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党的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昨天的战争》第二部已发表的章节中，也在这一方面进行着努力。我们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然而，也不能不承认，我们长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数量不多，质量也差，未能概括伟大历史变革中的人民群众于万一。在人物塑造方面，目前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说已经落在了短篇小说的后头。

长篇小说较为宽阔的天地，给予人物塑造以更

多的便利条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塑造出一个典型人物，但应该要求每部长篇塑造出不止一个典型人物。不然，怎么能叫做长篇小说？恩格斯赞誉敏·考茨基的《旧与新》中“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固然语多鼓励之意，却也窥知个中的艰辛。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有几十个、成百个、几百个人物在里面活动；在技巧高超的作家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这种每个人物无一不是典型的长篇小说可惜迄未发现。精致至极的《红楼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真正称得起典型的只不过十几个，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红楼梦》等著名长篇其所以永垂不朽、昭朗千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书中那些芸芸“情种”、“须眉浊物”、“国贼禄鬼”等典型人物的塑造；而主要的是宝黛典型的成功塑造。因此，广大的读者群众，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的一部长篇小说，至少塑造出一个艺术的人物典型出来。可是我们近年来不少的长篇小说作者在这方面没有下苦功夫，人物太多，个性不鲜明，平铺直叙，平淡无奇，许多人物成了过眼烟云，稍纵即逝，真正成为典型的，实在是寥若晨星呵！

如何使长篇小说的人物（起码是作品的主人公）达到艺术典型的高度，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需要更多的同志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讨论。这里，只想提出一个人物的真实性的问题，供探